

凤章文集

第四卷 报告文学

BAOGAOWENXUE

FENG
ZHANG
WENJI

传媒集团
文艺出版社
LITERATURE AND ART
PRESS HOUSE



凤章文集

4



报告文学

BAOGAOWENXU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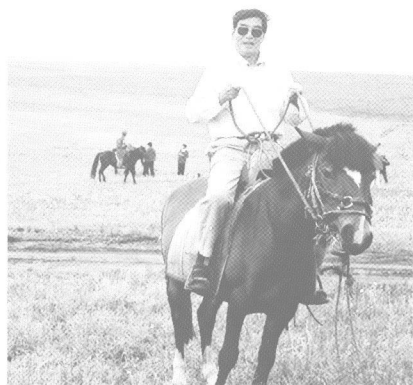
1996年摄于全国文学创作中心座谈会。左起：陈昌本、张锬、翟泰丰、凤章、陈继光（六）、陆天明（七）、张平（八）。



2000年冬摄于碧树园寓所院中。



1996年摄于北京。



2002年夏摄于内蒙古大草原。



2003年与老友梅汝恺在南京玄武湖。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“球籍”问题	[1]
路的呼喊	[33]
法兮归来	[45]
征服海洋的女性	[59]
人的“能源”的开发者	[79]
上告	[99]
倾斜的官司	[122]
扑向绿色的大地	[144]
时髦眼镜传奇	[160]
一篇未准备写的报告	[175]
起飞的大地	[189]
护林员和他的狗	[207]
溪涧岂能留得住	[214]
书画坛上一怪杰	[221]
诗乡画境	[229]
渡口家庭客店	[233]
六十五夜	[238]
一个发明者的故事	[248]
傲雪梅花	[257]
一个与淋巴癌搏斗的胜利者	[264]
老虎桥监狱话今昔	[271]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[285] 春天是这样开始的

[297] 张家港人

[400] 祝您一路平安

[482] 后记

“球籍”问题

——兼记中国大学教授们

引 子

漠漠无垠的宇宙，一颗小小的蔚蓝色的美丽的星球在悠悠地旋转。

这便是人类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地球。

本世纪 50 年代，中国一位伟人讲过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有个球籍问题；搞不好，中国将被开除球籍。伟人的这个警告，伟人似乎自己也未重视（也许他并不相信），因而中国没有能由此为“球籍”问题去拼搏、奋斗，却掀起连绵不断的一浪高于一浪的“人与人斗”之大潮，以达到“其乐无穷”的境界。结果是，迎来了“史无前例”、掀天翻地的狂飙巨浪的到来，差一点把中国这条航船弄了个底朝天。

当我们这个星球悠悠地转到本世纪最后一个龙年，即当人类站立在 21 世纪门槛之际，又有人提出中国的“球籍”问题。此次提问题者，不是伟人（伟人早已故世），而是一些记者、编辑，还有一些教授、研究员、专家学者，即一批知识分子。他们列举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中足以使我们这些“龙的传人”触目惊心的数字，如：

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28 个国家中排位,总是徘徊于倒数 20 多位,与世界上最落后的非洲穷国索马里、坦桑尼亚相近;若与先进国家比,仅是日本的 1/30,美国的 1/35,瑞士的 1/40;而这个水平,美国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达到。

1955 年,中国国民生产总值(GNP)占世界的份额是 4.7%,而 1980 年下降到 2.5%;

1960 年,中国国民生产总值(GNP)与日本相当,而 1980 年只占日本的 1/4,到 1985 年下降到 1/5;

1960 年,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 4,600 亿美元,而 1985 年超出额达到了 36,800 亿美元。

他们发出振聋发聩的惊呼:

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!

世界已向我们亮出“黄牌”!

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“球籍”问题!

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!

“球籍!”“球籍!”1988 年,是中国知识分子关于“球籍”问题的忧思年!

然而,当以龙为标志的 1988 年带着一身疲惫悄然离去时,我打开笔记本,翻阅不久前我到几个大学中采访的札记,忽然发现,我们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多么微弱!尽管他们是在加大音量呐喊!惊呼!呼吁!嗓子喊破,喉咙生烟,却总盖不过丰田、皇冠、奔驰卧车的滴滴声、美酒佳肴公费宴上碰杯的叮当声、豪华大厦里自动空调的微微呼吸声……

“球籍”问题确实令人心忧,但更令人心忧和可怕的是浓雾一般弥漫的那种“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式的麻木。

要有一声能够震醒深沉麻木的炸雷才好！

第一章 不等式

1988年，北京大学度过了她的90华诞。

9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北大，这个“五·四”运动的发源地，这个产生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最优秀学者、民族精华的最高学府，在她的诞辰之年，向10亿中国人又奉上新的光彩夺目的累累硕果——科研、学术上的5个第一，即：中国管理科学院首次利用科学计量指标发布学术榜，从全世界近4,000种最有权权威性的杂志上检索数据，北京大学名列中国（包括台湾）第一；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共179项，北京大学独得16项，在全国又为第一；国家教委颁布的1987年科学进步奖，北京大学获一等奖数和获奖总数第一；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，北京大学以8个特等奖、59个优秀奖的突出成就获第一；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评奖，北京大学又夺第一。

蚕吐丝。蜂酿蜜。

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。

北大教师呕心沥血。

你要知道北大教师的辛劳吗？你只要看看北大深夜的灯光。晚上十一二点钟到凌晨一点这段时间，你到校园宿舍区，到蔚秀园、畅春园、中关园、红四楼、黄庄等等地方，你看到哪扇窗户还亮着灯光，那必定是北大教师的住处，灯光下必定是熬得眼红的北大教师。这不是我夸张。我是老北大，我知道这是北大教师的传统。不信你敲门进去瞧瞧，准没错。至于你要我讲讲北大教师的生活情况，我一个字就可以回答你：穷。这也不是夸张。本人兼北大教工工会工作，又是分管福利的，回答这问题有点权威性。据统计，北京市人均年工资为1,343元，北大教师人均年工资却只有1,227

元,低于北京市 116 元;中、青年教师人均年工资更低,才 800 多元,和北京市差距更大。这部分人,教学、科研是超负荷的;上有老,下有小,赡养抚育是超负荷的;经济支出是超负荷的。这么多超负荷,钢铁也要折裂,人能不垮?北大病的、死的大多是这些人。去年上半年调查,北大教师患病率达 24.5%,而中年教师的患病率为 26.9%;校医院登记的 50 名癌症患者中,教师就有 23 人,其中中年教师占 17 人。1984 年、1985 年两年北大死亡 36 人,教师占一大半,为 22 人;其中副教授、讲师又占死亡教师的大半,为 17 人。中国知识分子“价廉物美”,却不“经久耐用”。真是: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穷能致死。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是穷惯了的,好在他并不怕穷。所谓“安于清贫”、“安贫乐道”即是。长铗归来兮出无车?可以。生就两条腿可以走路,可以蹬自行车,可以冲锋陷阵去挤大巴士。长铗归来兮食无鱼?可以。酱菜萝卜干,茄子白菜保平安,缺少点动物蛋白不在乎。可是,长铗归来兮居无宅,或者“宅如笼”(对不起,我把有些大学教师狭小的住房称之为“笼”,失敬之至,然而却很真实),就难以忍受了。知识分子怕就怕在这个“居无宅”或者“宅如笼”。自从有巢氏发明房屋以来,房屋便成了人类区别于兽的生存空间。人类的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和自身的繁衍,统统离不开这个生存的空间。大学教师,人也,而且人之师也,总不能“居无宅”吧?再说,不是“安贫乐道”吗?大学教师所“乐道”之“道”,当然是教学和科研。教学、科研起码得有个备课的地方吧?得有个可以伏案看书的地方吧?要求极低,一张书桌的方寸之地而已。在如“笼”之宅里,又如何能“乐道”呢?可是北大,中国堂堂最高学府,至今还有不少教师处于“居无宅”或“宅如笼”的境地。我说的这个“不少”,不是几户,不是几十户,几百户,而是上千户。不信?有据为证。去年《北京日报》报道,北京人均居住面积达 6.7 平方米;而北大去年 9 月调查统计,北大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6 平方米,

远低于北京人均住房面积。现在北大有近 600 名青年教职工领了结婚登记证,却无房结婚;有近百名结了婚,仍然“居无宅”;其中不少人有了孩子,因无住房,孩子报不上户口,买不了油粮。有近 800 户拥有 20 多年教龄和工龄的副教授、讲师、职工,居住的是一间或一间半如“笼”的斗室。

已登记而未成婚礼的无房者,盼房盼得望穿秋水,这且不说,那些已结婚的无房者,少夫少妻,各守孤灯,鹊桥难渡,实在有点不人道,于是便出现了“周末鸳鸯度春风”之景,即:集体宿舍同室中,一人是已经结了婚的,另一为未婚者,一到周末,看在哥儿们情谊分上,未婚者回避一宿,让一对鸳鸯做上一次巫山好梦。如果同室中两位都是已婚的无房者呢?那更好,机会均等,此周末我让你,下周末你让我,谁也不欠谁的情。

户口,对每个中国人来说,有如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一般,实属性命交关。无房户生下孩子报不上户口,便不能购买平价油粮。区区教师工资,哪能受得长年累月的黑市高价?没有户口的孩子也上不了托儿所、幼儿园,进不了学校。于是,北大便又出现了“厕所户口”、“影子户口”、“口袋户口”等等奇事。其实,说奇也不奇。比如,校内某幢宿舍楼住户已满,无法再安户口,正巧大楼旁有一公共厕所,便把这厕所编上门牌号,无房者把户口安在这门牌号上,人们便戏称这为“厕所户口”。也有人干脆把户口报在那住户已满的大楼里,自己实际仍在集体宿舍,这户口便为“影子户口”;此类户口并无房屋的依托。房屋是虚构的,人是实在的,人即户口,所以又称其为“口袋户口”。这还是学校和派出所再三通融,行上天好生之德,给予教师的一个瞒上不瞒下的照顾。虽然如此,能报上上列户口者,占有孩子的无房户的比例也是微微。

至于那些已获得如“笼”斗室的副教授、讲师们,其境况比无房者也好不了多少。这些人一般年纪四十大几,五十左右,有一至两个孩子。孩子半大不大,都上学了,懂事了,挤挤轧轧安上一张小

书桌,要和儿子女儿轮番用。夜里睡觉,床靠床(也有全家只睡一张床的),说句大白话,夫妻俩连做爱也无法做。一个大小子或者丫头睡在边上,你夫妻能做爱?有位副教授对我说,他很久不过性生活了。孩子懂事啦。躺在旁边,你知道他是睡是醒?有善谑者问孩子:

“夜里你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没有?”

孩子睁大眼,没明白。

“我问你夜里看到你爸你妈做什么了?”

孩子脸涨得血红,“呸”了一声逃了。

这玩笑开得虽说有点无聊,可旁听者心中凄然,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极度狭小的生存空间,把人性遏制、压抑、扭曲到何种地步!我真佩服我们中国人的忍受力。

北大,我们这个庄严而美丽的学府,神圣的科学殿堂,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等式。北大教师人均收入低于北京市人均收入,是不等式;北大教师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,又是一个不等式;北大教师对国家、社会的巨大奉献与国家、社会对北大教师的给予,更是一个不等式;教师付出的辛劳和为维持精力、体力所需而得到的补偿,仍然是不等式。你到我们北大一些教师家走走,你无论敲开哪一家门,你都会发现不等式的存在。

怎么样?试试如何?

三 人 床

床,有单人床,双人床,还没听说过有三人床。

然而北大物理系讲师赵一广家睡的就是三人床。夫妻俩和13岁的女儿,一家三口就睡这一张三人床。

爱人也是物理系讲师。中国教师的工资虽低,两位讲师的收

人总是可以再买一张小床的。可是,13平方米的空间,再也容纳不下小床的位置了。

书、书橱、箱子、衣橱、碗橱、小桌、盆、桶、罐、椅、木凳,宛如物质的原子排列一样,排得紧紧密密。如要取书橱里的书,先必须搬开挡住书橱门的半截橱;要搬半截橱,先必须搬开挨着半截橱的那张直径50公分的小圆桌;要搬开小圆桌,先必须移开木椅;而木椅上又有堆得金字塔似的书,于是先要搬书,才能移动木椅。真是,动一书而牵动全屋。那张三人床一面靠墙,三面都挤塞着东西,活像楔子一般塞在屋里,哪能再安小床?

三人床,正确的名称应为三人睡的床,因为它实际仍然是普通的双人床。女儿个子长得和妈妈差不多高,双人床如何能容三人?于是两位物理系讲师采用了原子重新排列、组合的方法:原来是顺着床的长度睡的,三人改为顺着床的宽度睡。但人体的长度超过了床的宽度,睡下来又双脚悬空,如何吃得消?于是,便临时顺着床沿垫着一块狭木板。为了扩大空间,那木板在人起床后即撤。

“从女儿出生,到长大,现在进了初中,我们一家睡三人床,睡了13年了。看样子还得睡下去。”讲师苦笑着说。

我进门时早已过了午饭时分,讲师和女儿还在小圆桌上吃饭。女孩儿长得白净精瘦,细长条型,貌颇如父,匆匆吃完,便上学去了。讲师也放下碗,奉茶待客。

小圆桌上仅有一碗吃剩下的煮大白菜。

讲师说,他爱人到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去了。她一做实验就是一整天还带个早晚,常常是两包方便面或者两只面包,便为她一日的餐饭。讲师说,家里饭菜也简单,什么方便,什么省时,就做什么饭菜,因为他的时间也极紧张。

“我是物理系85级级主任。每星期还要上4节大课。还有科研任务。我是研究半导体激光的,我在搞‘激光测距’的科研,这是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。还有编讲义,写学术论文……我恨不得每

天24小时都能工作才好。我把生活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。我没有星期天，我从不度假日。孩子埋怨我：‘爸，你就不能带我去一次颐和园？’我实在舍不得时间，只好狠狠心。想来，我对孩子十分内疚。但更叫我对不起孩子的，还是这张三人睡的床。

“孩子老问：爸、妈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什么时候让我单独睡张床？”

“我和她妈只得骗孩子：‘快了，快了。’口里这么说，心里难受得直打颤。

“不错，我们国家穷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可我去年到过锡兰，也就是斯里兰卡，亚洲著名的穷国，那里科伦坡大学的讲师，一家住一幢屋。今年我去意大利参加‘半导体激光与集成光学’国际学术会议，访问过他们的大学，那里的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住的是花园洋房。意大利我们固然比不上，为什么连亚洲穷国斯里兰卡也比不上呢？”

“其实，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造的新住宅也不少，北京就竖起许多多的高层住宅大楼。可你看看里面住的，有几户是大学教师？很多还不是些有官职的住，或者是有官职的子女，甚至子女的子女住，大干部中有像我这样睡三人床的？”

“我八十多岁的老岳母，不幸把腿摔断了，家里没人，想来女儿处有个照应。可我这里能来吗？只有这张三人床。

“去年我回老家河南探亲，我老母亲想跟我来北京玩玩。她说，儿子在北京当大学教授，做娘的连一次北京都没来过，岂不太亏？可来了怎么住，我只有这张三人床。

“两位老人最起码的愿望都没能实现，她们心里难受，我和我爱人心里能好受吗？”

“在今年意大利的国际学术会上，我带去了两篇论文宣读，得到好评，后在一大学实验室做实验，那实验室主持人，一位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要我留在他那里工作，做他的助手，可我拒绝了。我回来了，回来睡我的三人床。

“人也怪，我害怕睡这三人床，可偏偏要回来，莫非我家和这三人床结下不解之缘？”

“孩子仍在一天天地长大，我家三人床不知还要睡多少年月？真叫人寒伦。说实在话，我现在真想出去，想到邀请我的意大利去。”

至此，讲师叹了口气，像自语，又像问我：

“何时才能不睡这三人床？”

我默然，无言以对。

血染的风采与一元钱

他在讲坛上倒下去了，再也没有起来。时年 48 岁。

《北京日报》在一篇报道中赞叹：“在这讲坛上，也有那血染的风采。”指的就是他，北京大学无线电系系副主任、副教授杨同立的猝然辞世。

这位为我国通信卫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中年科学家，这位曾获国防科工委科技二等奖以及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优秀学者，这位为学生们爱戴的老师之死，令人们震惊而悲痛。

无线电系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以校长丁石孙为首的校领导都来了。追悼会的悼词对死者作了热烈而又感人的赞颂：

杨同立同志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卓越的才能，朴实无华的作风，在困难的条件下，取得多项优秀成果……杨同立同志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；在国际学术活动中，为我国取得了荣誉。他的全部心血都洒在我国科技、教育事业之中……

这简直是一篇英雄的颂歌。

副教授遗下了在另一大学做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年仅 13 岁的未成年的女儿。

追悼会开过，丧事办完。对这位“全部心血都洒在我国科技、教育事业之中”的死者的遗属——未成年的女儿，按规定需发遗属生活补助费，以使遗孤的生活得到保障，健康地成长。这也是对九泉之下的人的一个安慰。

每月补助多少钱呢？经有关部门议定，竟是一元人民币。

决定传来，死者家属，初则悲愤，继而木然；死者同事，初则惊愕，继而哗然。从助教、讲师到副教授、教授，莫不心寒。

中国知识分子固然“价廉物美”，也不致“价廉”到如此地步！

一元人民币，在 80 年代的中国，其市场的实际价值为：

仅够在王府井小摊上买一串冰糖葫芦；

或在小食品店购两只面包；

或在早点铺里买 5 只油饼；

或在糖果店里买 10 块夹心水果糖；

或在叫卖冰棍的小推车上买两块花脸雪糕；

或买一串现烤现卖的羊肉串……

13 岁，正是孩子的成长发育时期，身为“遗属”，亦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，吃、穿、住、用、读书上学，无一可缺，难道拿这一元人民币去作“画饼充饥”用吗？

我见到了副教授的妻子。

副教授去世两年了，家里特别清冷。她是讲师，刚刚下班回家，未来得及生炉子，更觉寒丝丝的。女儿 15 岁，个子一个劲儿地拔高，可白苍苍的脸色，显得羸弱，却很懂事。她和客人说话，女儿默默地热情地给客人递茶送水。

“同立是活活累死的。他像一部不停飞转的机器，一直超重负荷地运转。

“他是分管全系科研的系副主任，还上大课，还带研究生，还为

国防科工委搞科研项目，参加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。他没有休息日，寒假暑假没有他的份，他太忙。他父母在天津，天津离北京两小时路程，他就是没时间回去。在他去世前那个暑假，他终于去天津探家了。原想多呆几天，可才呆一天，便又回北京了。学校科研经费下来，系里要他研究安排。接着便出差，去湖南开科技会议。到那里就病了。从湖南回来，到家是夜里11点钟。第二天一早又赶赴山西太原，那里有国防科工委项目，某通讯兵部队的仪器设备等待他调试哩。他就在那露天院子里，站着干了一天一夜。从山西回来就上课，上完4节大课，又去沙河开鉴定会。从沙河回来，感到脸发麻，特别想睡觉，可还是每天上班，在系里忙。

“我要他看病，他说没时间。他从来都是这样：要他今天去医院，他推明天；到了明天，又推后天；到了后天，又推再后天，总是没空，最后还是不去。他舍不得时间，这次我可发急了，不去不行，他才同意让我给他挂号。我在西苑中医研究所给他挂的专家门诊，挂号费两元，他后来知道了，埋怨我不该花这么贵的挂号费。

“他10点钟下的课，匆匆赶到医院，两手粉笔灰，拎着个破提包，让大夫看病，大夫要他休息，他自以为是受了风寒，说没关系，照样上班、上课。万没想到，那天在课堂上倒下，就再也没能起来。

“我和女儿怎么也想不到他从此与世长辞。他走得那么突然。病危之际，他向探望他的同事嘱咐了系里的工作，却来不及留下对亲人的嘱咐，便离开了我，离开了刚刚给他喂饭后匆匆上学去的他最心爱的女儿，离开了人间。

“同立是活活累死的，他给国家、给人民作出了贡献。他没有虚度年华。与地球同步的通信卫星上有他辛劳的汗水；他的智慧、才能、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。可是这一切，在中国有些人眼里，又值几何呢？除了追悼会的悼词外，几乎不值一钱。

“我实在想不到，他们给同立的遗属生活补助费每月竟只有一元人民币。开始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，后来他们解释了给一元